

孝义旧城集会探寻

□ 郭庆龙

在历史的长河中,孝义旧城的集市,散发有独特的魅力。据资料记载和学者考究,从民国时期到当代,这一方天地,承载着无数人的生活片段,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始终是热闹非凡的物资集散地,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孝义旧城的集市就已颇具规模。一月一会,五天一集,商品贸易、物资交流频繁,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那时的集市,以中阳楼为中心,向四周延伸。中阳楼始建于汉魏,元大德地震塌毁后明代再建,清同治、清宣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扩建和维修,它是古城的精神地标,见证了集市的兴衰荣荣。每逢集日,南从桥南楼门起,北到城北门止,二里多长的正街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商家们撑棚搭架,摆摊设点,临时商贩一家挨着一家,把街道挤得满满当当。人流如潮,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大小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在集市的各个区域,有着明确的功能划分。出城南门东是饮食市场,空气中弥漫着各种美食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梁家的碗秃、良良的糕、刘家的醪糟、任家的肉火烧、二昌的

凉粉、三元元的饺、老九厮熬的豆腐脑、三太成卖的杂割菜、野雀则的合碗子好”,这些特色小吃的摊点一家接着一家,让人目不暇接。卖什锦菜的头戴礼帽,身穿大褂,坐在摊前大声卖唱;“桃仁仁来杏仁仁,核桃仁仁豆仁仁,清源的黄瓜晋祠的藕,荆针木耳耳边有,蘑菇海带花生豆,一吃一个不开口,吃得香来咬得脆,三毛二毛动海味。”他那独特的叫卖声,为热闹的集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东面的牲畜市场上,大骡、大马、毛驴、黄牛成百头,被拴在四周。钉掌匠人为骡马钉掌,手中器具敲出有节奏的“叮叮铛铛”声。经济人(俗称牙行)忙着和卖主买主暗瞪捏码子,双方交头接耳,喜眉笑眼,那神秘的动作让人充满好奇。

东巷是猪羊市场,西巷为古董寿衣店,楼门东街是杂货卖艺市场,楼门西街为柴炭市场,大西面还有瓜果蔬菜批发市场。在杂货市场,场地中央竖起高高的木杆,五色布旗高悬,左右两条绳子从顶落地高挂,场内锣鼓喧天。菜包子主演的“刀铡活人”“高空斗武”“吞宝剑”,一枝梅主演的“天女散花”“二女飞天”,招来千人围观。场地周边,钉鞋的、剃头的、拔牙

的、卖膏药的艺人各展其艺,大显神通。而古董寿衣店中,各种摊点琳琅满目,五光十色,商家叫卖着:“长袍马褂连衣裙,八音盒子自鸣钟,金银首饰和锡器,还有卖的出土玉,古玩古画古钱币,傅青主的真笔字,任你挑来任您选,当看贵客两只眼。”这里的顾客大多是城里的市民和文人学士。

新中国成立后,孝义古城的集市日期统一改为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举行,即逢五是集。虽然时间有了变化,但集市的热闹程度丝毫不减。周边农村的人们依然会在这几天,或骑车、或挑担、或肩背,带着自家的农副产品来到集市,进行交易。集市上,除了传统的商品,还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物件,如塑料制品、新式农具等,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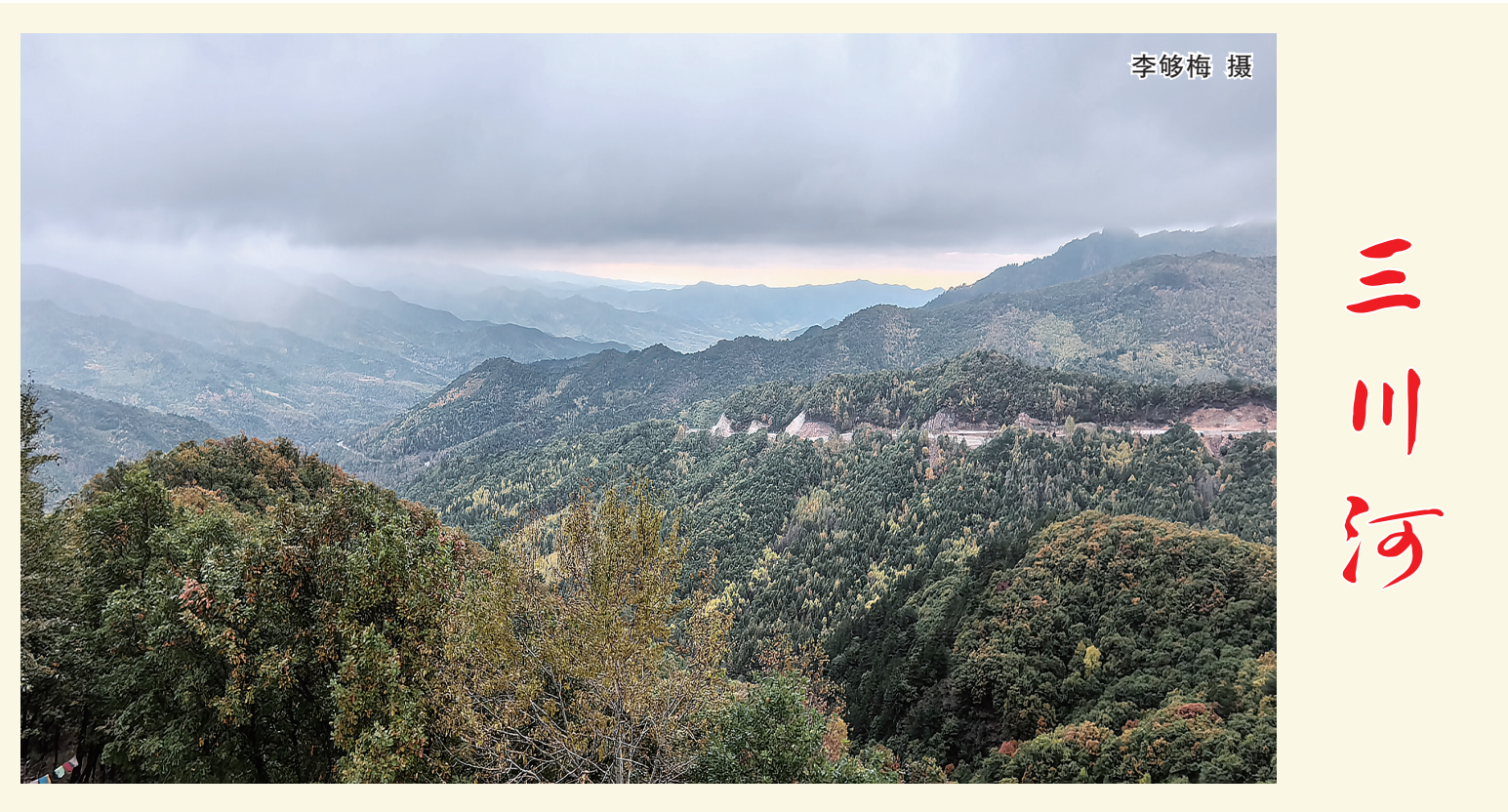
如今,走进孝义旧城的集市,依然能感受到那浓浓的烟火气。集会以中阳楼为中心,贯穿南北、东西两条街道,南北街道依旧是集会的主要集中地。腊月十五,集会上大多是年货,对联、衣服、鞋帽,还有各种孝义特产,应有尽有。干果摊前人声鼎沸,商户热情地给客户对比不同产地的枣;调料摊上,各种香料散发着独特的香气,为腊月做肉的人们提供着必不

可少的食材。

在现代社会,虽然网购日益普及,但集市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在这里,人们不仅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还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交流。讨价还价的过程,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乐趣;老友重逢时的寒暄,让人心生温暖。集市上的民间艺人,依旧为人们带来欢乐,说书的、唱戏的、耍杂技的,他们的表演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孝义旧城的集市,还流传着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其中,“火烧中阳楼”的传说在当地广为流传。早在汉魏年间,孝义县城中央的永安市场中心就盖起了宏伟高大的中阳楼。清朝年间,恰逢永安市场大会,车骑缤纷,商贾云集,中午时分,街市正热闹。一位卖火烧的小贩一边制作火烧,一边高声反复叫卖:“大家快来买火烧,吃了火烧火不烧。”这看似平常的叫卖声,却仿佛一语成谶,后来中阳楼真的遭遇了一场大火。还有就是孝义连年五谷丰登,人们有了浪费粮食的不良习惯。火神化一老翁,背着一个大火烧在旧城街上走着。人们说:“好大一个火烧。”老翁说:“你说我的火烧大,后面还有大火烧。”老翁走过中阳楼,中阳楼就发生了大火,以此警示人们不得浪费粮食。这些传说,成为了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为中阳楼和集市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而旧城的火烧饼子,也成了孝义的名吃。

从民国到当代,孝义旧城的集市历经岁月的洗礼,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物资集散地,满足了周边人们的物质需要,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承载着风土人情,记录着人们的生活故事。在旧城改造后,希望这充满烟火气的集市,能继续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人间值得

□ 李峰

尝不是三个很可爱的小雏鸡呢。之后的岁月里,我们都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日子中,总是离多聚少。一晃已一个甲子过去了,多么留恋那窑洞、那土炕、那些夜晚。尤其是父母走了之后,从血缘关系上讲,兄弟就是最亲近的人了,真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关系。这份兄弟情,是值得一生珍惜的,那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是一脉相承的血脉。

算起来,大学毕业已经41年了。这么些年里,每次聚会,同学们都会回忆起当年在一起学习、生活的一些事情,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次分别,都是依依不舍。1980年,我才17岁,就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来到太原求学。说实在的,我很知足。原因之一,就是我考进了我喜欢的专业——文学。仔细回想一下,如果我当时,插了队,顶替上了班,或者考到别的专业,我的人生之路,就又是另一个版本。我发表的第一篇散文《甜苣》,就是在写作老师孙秀乾先生的指导下,发表在《大学中文刊报》上的。那是一个很薄的册子,但,很正规,还有书号,这篇散文,应该算我的散文处女作,我把它收在了散文文集《白菜花》中。也就是从大学时期,我就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一走,就是40多年。孙秀乾先生还为我起了个笔名“河清”,并注明意为“黄河清,圣人出”。多年间,我断断续续用过一些。能看得出孙先生对我的期望与鼓励。毫无疑问,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把我培养成了一个作家。我为我的选择骄傲,此生值了。记得,读中文系期间,我与几个文学爱好者,在家乡,办起了春笋文学社,油印了《春笋》刊物,封面是我在刻蜡版纸上画的,画面是一个大春笋,寓意着我们的文学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的文学梦,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大学里,我还加入了春禽文学社,并积极撰写稿件,帮助油印《春禽》刊物。想想,那真是一个文学家的梦想天堂,一个梦想起飞的地方。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大学毕业前,我就写出了《谈谈微型小说的写作》,被《中小學生拼音报》连载,并完成了毕业论文《比较(金钱)和(子夜)的结构与人物塑造》,刊登在《山西文化》上。那个年代,我的空气中,无时无刻都弥漫着文学的味道。还有我的诗歌老师马作楫先生,多少年间,我们亦师亦友,书信之间,谈诗歌、谈人生、谈处世。我24岁,出版第一本诗集《青春的光》时,马作楫先生还为我写了序言《执着的追求》。他写道:“这是一片桃李情染绿了的诗心在跳动,也是对诗爱的真诚的心在心心呼应。”就是这桃李情,不仅染绿了诗心,更染绿了我们的师生情。之后的日子里,我多次去山大拜访马作楫先生。我把他送我的《马作楫文集》摆在书柜里,把与他的合影,珍藏 in 影集中。那些书、那些照片里,都写满了:人间值得。

从人生历程上来看,我算是很幸运的一个。念大学,上了自己喜欢的中文专业。毕业之后的工作,又大部分都与文学、文字有关。最早在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宣传部工作,调回县城后,便从事秘书职业。之后,一直在广播电视部门,担任领导干部,直到退休。回过头来看,有些事是很蹊跷的,仿佛是命中注定,又像是一种缘分。我一参加工作,在汾酒厂宣传部,结果

退休时还是在市委宣传部;离开汾酒厂时,我是广播电视站站长,回到县城后,在广电领域领导岗位一干就是二十四年,退休前还兼任着汾阳广播电视台台长;在汾酒厂我拿到了《山西教育报》的第一个记者证,退休时,我交回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期间,取得了记者的中级职称,并被授予“新闻采编专家”称号。这些好像都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我来说,一生喜欢文学,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写过材料,当过秘书,搞过新闻,从事过宣传工作,而且,一辈子与文学不离不弃,写作、发表、著书立说,存留后世,值了。

事业和爱情,是人生两件重要的事情。我与爱人最早相识,也是因为文学。上大学读中文系时,我们几个同学,组织起了春笋文学社,办起了《春笋》油印刊物。那个年代,没有激光照排,也没有电脑打印,文学社的成员写好作品后,就要找熟人打印。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春种秋收》,放假后,就回老家找人打印。那时,年轻认识人少,更不知道谁家有机印机。我的三姑就帮我找到了县政府办公室的同学,她是打字员。她接下我的手稿后,便应了下来,答应不忙时,帮我打。没几日,我的那个小说就打印好了,我校对后,便正式印了出来。之后,就和其他文学社成员的稿子,装订成册,便产生了第一期《春笋》。又一个假期到了,为了表示对打字员的感谢,我买了一个玻璃小杯,送给了县政府办公室帮我打印小说的打字员。她就是后来我的结发妻子,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应该说,是文学牵起了我俩的姻缘,让我们相爱终生。结婚后,回忆起当时的相识,她告诉我,那个水杯她一直珍藏着,放在她们家窑洞的壁柜里。我的那本《春笋》油印刊物,也一直保存着,放在我的书柜中。什么是缘分,这就是,值得一生珍藏。

没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我也是。仕途上,我在而立之年,被任命为汾阳县广播电视台副局长,不惑之年,主阵汾阳广电。从副局长到一把手,在汾阳广电一干就是24年。2010年至2017年,还兼任中共汾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这个连芝麻官也不算的“小吏”,给了我一次施展领导才能的机会。也就是相当于,我在汾阳广电做了14年“将军”。说真的,我当得很难,但又当得很值,很快乐。难是难在这个摊子,缺钱、缺人、人事关系复杂;值是我在任期间,彻底重塑了汾阳广电的形象。14年中,汾阳广电资产不断壮大,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好作品频频获奖,文明建设从县级文明单位,一路攀升至山西省文明单位。可谓是一路艰辛一路歌。那些年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别人称呼你个什么长,而是我的价值能变成千部群众的口碑,我的爱好特长能变成工作的本领。在人生的一生当中,什么是幸福,能把个人的智慧变成社会实践的行动,能把自己的爱好与工作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幸福,再苦再累也是快乐的。当官不在大小,不在长短,做点事,做好一点事,就好。此生值了。

人间值得的事太多了。在这条漫漫的人生路上,无论荣华富贵还是苦难重重,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是我们活过的生活,都值得珍惜和怀念。

《命运的魔方》是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李心丽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以老桑和他儿女们的命运沉浮为主线,抒写了当代社会转型期间城乡生活的真实现状。

文章记录了吕梁山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初整整四十年间,一个农村家庭的巨大变迁,通过写一家人的生产经历与生活点滴,反映出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农村人的奋斗与发展,以及从农村走向城市,城乡四十年间的变化历程。

生活在黄土地上勤劳朴实的桑来福夫妇养育着五个孩子,他们有着朴素积极的奋斗目标:通过在土地上辛勤耕耘,供孩子们读书走出农村、改变命运,刻画出乡村人家质朴无华、积极向上的优良家风。

全文于理性客观的叙述中,围绕家人间互助温暖的温馨亲情,按照从前往后的时间线铺陈开展。李心丽用文字记录自己经历的生活,然后加工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看过路遥著的《平凡的世界》,我们知道了七八十年代中国城乡社会变迁的背景,通过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的奋斗历程,展示当时陕北农村普通人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看过李娟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笔法描述的哈达克族人生活的《我的阿勒泰》,透过她的私人感触,我们了解了二十一世纪初呈现在北疆边地的风土人情。通过阅读萧红的《呼兰河传》,知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黑龙江呼兰河冰天雪地的小镇里,小城民众的缩影……

李心丽创作的《命运的魔方》展现了与《呼兰河传》《平凡的世界》《我的阿勒泰》意义相同、环境全然不同的生活和风物,于浓厚的乡土味中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人的命运真的很神奇,一个家族的命运更神奇,真的像魔方。孩子们不负老康夫妇的期望,一个个取得优异的成绩,纷纷走出农门,在城市工作。她们的成功不仅仅是运气,而是千锤百炼的努力与勤劳,是无私奉献与积极向上,是以上率下与团结一心,是优良家风凝结出的累累硕果。

父母勤苦务农,养育子女,孩子们刻苦学习积极向上,然后走向社会辛勤工作、努力打拼,最终赚来好的人生,好的结果。

从小听大人们说临县人能吃苦、重教育,走出农村上学工作后,见证了他们的吃苦耐劳与积极向上。《命运的魔方》中的桑家人是那片土地上的突出代表。

家庭是社会中最古老、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留下正确的价值观、财富观、生活方式,往往比留下金钱权利更为重要。“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变迁就是时代变迁的缩影,家风的存在也必然是与社会风潮相适应的。好的家风示范作用巨大,给周边邻居乃至周边村镇带来好的效应,带动好的民风。好的家风,是一种无形的教育,也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

家风是一个家庭长期培育形成的一种文化和道德氛围,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是家庭伦理和家庭美德的集中体现。家风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家风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约束其成员,又能促使家庭成员在一种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氛围中不断发展。

桑家的家风无疑是当代农村的典范。古人说:“家和万事兴。”良好的家风,是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它像一盞明灯,照亮家庭前行的道路。它让家庭面对困难时,团结一心;让家人在岁月变迁中,相互扶持;让亲情在时光流转里,愈发醇厚。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对待供养梁小鱼的事上,桑来福说:“钱是受苦人身上的一层汗,我多流几身汗,换来我愿意。”“责任像契约一样。”,这话语多么朴实,这行为多么伟大!桑来福提出给祖坟立碑,自己主动承担起出钱事宜,凡此种种事情,显示出他的心胸与格局,其实这就是桑家优良家风的根源所在吧。

桑家家庭里的五个儿女,即使成家,有了自己的小家,但是他们始终把小家庭规范摆放在大家庭面前,这个家庭的成员无论是找工作是买房子,只要需要钱,“他们的想法高度一致,谁能拿出多少钱,谁准备多少钱,都自觉帮忙了。”“多年来,桑家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有什么事全家人一起参与”。

给桑家买房子,给桑红与桑果找工作筹钱,对梁小鱼的无私帮助,桑来福给祖坟立碑,无一不显示出这个大家庭的和睦团结。

文章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自然流出血脉亲情与暖暖爱意来,如:在小妹妹被换走前一晚,万般无奈、难过流泪的桑枝在炕上环抱着小妹妹惜别的场景,这一个细节我眼眶发热,心疼她的无奈与无助;看到桑果和桑红谈起桑树过懂董事,从小到大自然承受着关于身世的心理负担时,她们心疼地哭了,我也跟着流泪了。柔软的心灵背后是善良的品质,这背后是父母良好的言传身教,是优良的家风的反应。

社会是多元的,出路也是多种多样的。姐姐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弟弟外出打工也可以改变命运。桑家儿女的前途与命运是农村改革开放潮流下一代人的缩影,是代表。

现实中的李心丽,给人的感觉始终是坦诚谦逊、平和恬淡,低调内敛。是一个安于生活,享受当下生活的人。出身于农村的她,把农村人的友善待人、质朴无华完全保留了下来。

我与她是一个时代的人,她经历的这个时代我也经历过,读这本书,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留给了我们许多珍贵的回忆。

一部小说,就是一本编年家谱,一段乡村的记忆,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优良家风造就奋斗人生

——读李心丽《命运的魔方》有感

□ 乔达爱

“人间值得”这四个字,足够珍惜,珍藏了一生。

我是去年在一辆出租车上,看到这四个字的。那是一个秋日,我坐在出租车的后排,偶然间,看到后视镜上,挂着一个红色的吊牌,长方形的,上面写着“人间值得”。开车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看样子,很沉稳,也很本分。之前,很多的出租车上,也都挂着这种吊牌,有的是挂着一个葫芦,有的挂着“恭喜发财”,有的挂着观音菩萨,也有的是挂着一个“忍”字。我想,挂什么吊牌,一定与司机的喜好,或信仰有关,也一定与司机的修养相关。挂“人间值得”吊牌的,肯定是他喜欢这四个字,他珍惜这四个字的分量,或者说,他热爱这个人,热爱生命、生活。那天,我坐在后排,用手机,把那个吊牌,拍了下来。那时,我在想,一个出租车司机,整天风里来雨里去,起早摸黑,拼命拉客。遇到运气好时,一天下来,赚个三五百元,赶上运气不佳时,耗上一天,也指不定能赚几两碎银,说不准,还不够交份子钱。但,就是这样的日子,他也坚信:人间值得。这就是活着的定力,活着的滋味。我很敬佩那个出租司机,也很敬重那四个字。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个说长不说说短不短的日子里,闭着眼睛一想,那些人间的风风雨雨、宦海沉浮、恩怨恩怨,都过去了。所有的人间疼痛,都过去了。有人说:“感谢生活。”我说:“感谢人间,感谢在人间这一遭。人间真的值得。”

尘世中的一切都安静下来后,我喜欢一个人,独坐在窗前,看窗外月季花的绿叶、花朵,还有那些星星点点的刺,一片叶子黄了,一朵花枯萎了,慢慢地落在地上,那么安然、安逸;也喜欢一个人,在一条小径上散步,不看小径之外的高楼不听汽车的鸣笛,只在乎小径的清爽与宁静。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最适合回忆,最适合品味。无所谓对错,也不再分轻重缓急。此时,我就像一根随风摆动的柳条,一池春水中游来游去的一只野鸭。或者是,在一个黄昏,独自坐在树林中一只条椅上的一个老者。落日中,正陷入散漫的回忆。

一只小麻雀,落在一棵银杏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多好听呀。六十多年间,都在为生计、功名奔波,已厌倦了那些轰轰烈烈,跌宕起伏。此时的我,只要一眯起眼,就会想到,年少时,我们兄弟三人,睡在一条土炕上,整夜关注孵小鸡的情景。那时,我们住在汾阳县城指挥街13号的一个大杂院中,大院北面是五间窑洞,中间三间归原房主,两边各一间为房管会的,分配给我们家居住。父母住西边一间,我们住东边一间。那一年,我们家喂的一只老母鸡,开始孵小鸡。父亲怕院子里的其他鸡,糟蹋老母鸡肚底的那些鸡蛋,便找来一只柳编的筐子,并在筐子底,铺上一层麦秸,然后,把鸡蛋一颗一颗摆了进去。最后,再把老母鸡放进去。用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一间产房。这个孵鸡的筐子,父亲就放在我们住的那间窑洞里。这样,既安全又凉快。白天有时候,老母鸡就跳出筐子,到院子里找食吃,不过,时分不大,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还是跳进筐子里孵小鸡。这个筐子的位置,离我们睡觉的土炕很近。夜里,熄灯后,我们弟兄三个,就爬在枕头上,看一会儿孵小鸡。一边看一边掰着指头,数小鸡孵出的时间。有一天傍晚,父亲告诉我们说,那些小鸡今夜就要破壳出来了。我们三个听了很兴奋。那一夜我们就都爬在枕头上,谁也不肯睡去,三双眼,都在盯着筐子里的动静。果然,到后半夜,老母鸡肚底的那些鸡蛋,就有小鸡一个个破壳而出,毛绒绒的,个个都很可爱。那一夜,我们弟兄三个,都没睡。直到天亮后,才跑到西边的窑洞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想想,那个时候,我们弟兄三个,是多么的亲热、亲近。那一条土炕上,不知留下了我们多少美好的夜晚。在父母眼里,我们又何